

# “假特供”背后的真问题

蒋萌



## 今日论语

自本月起, 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开展集中清理整顿假借国家机关名义生产销售特供、专供商品的专项行动。央视《每周质量报告》也报道了贵阳市查获一批假冒武警特供、专供酒。

不禁想到前些天老友聚会, 一位老兄带来一瓶茅台酒, 上面赫然印着“××军区专供”。这位仁兄混得有头有脸, 酒大概也是“买的, 不喝的, 不买”。不过, “专供茅台”的口感很可疑, 极辣嗓子, 喝点就晕, 丝毫没有醇厚绵柔之感。现在看来, 八成就是“假冒特供”。

形形色色的假冒特供品的本质都是“拉大旗做虎皮”。之所以有市

场, 一是瞄准了特权人群, 二是抓住了两种微妙心态——送礼者讲究面子与够意思, 看重的是包装、档次, 对高价不但不排斥, 还觉得越贵越能“聊表寸心”, 试图令公关变得顺利; 收礼者往往怀有虚荣心, 认为高价高质非一般人消受得起, 特供专享才能体现“高人一等”, 即使事后发觉特供品有问题, 也不会投诉维权。在特权享受特供的过程中, 灰色乃至腐败交易随之出现。假冒特供品的生产者趁机浑水摸鱼, 赚得盆满钵满。

普通百姓偶尔也能接触到真真假假的特供品, 此时人们的心理同样值得揣摩。或许, 可以总结为“臭豆腐效应”——闻着臭, 吃着香。尽管许多人痛恨特权与受贿, 可如果有机会尝试“沾光”, 未必会拒绝。这不只是好奇心作怪, 一些人甚至会

怀着羡慕的目光打量特供品。此时, 问题已不在特供本身, 而在于人的贪婪与攀比。

真的特供品并非传说。但是, 特制决定了数量稀少, 在供给上也比较低调。毕竟, 搞特权上不了台面, 以权谋私者巴不得神不知鬼不觉, 怎么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正因如此, 那些满世界宣传、唯恐别人不知道“特供”的, 往往是噱头扯淡, 是为了牟利。

比如, 某个曾标榜“航天员专用”的牛奶品牌, 却接连闹出学生饮用后集体中毒、被检出致癌物超标、更改生产日期等丑闻。虽然该品牌近期全部更换包装, 也不再提特供了, 可革面之后能否洗心, 还得以观后效。

治理专供乱象,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真的假特供”——与“被供应单位”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假冒产品, 工商与质监部门理当给予严打, 阻断制假售假的暴利链条, 不能让劣质产品披上华丽外衣坑人。对于“假的真特供”——知名机构有偿出让自身名号、变相为问题产品代言, 有关部门必须进行专项整治, 严禁并严惩利用机构公信力换取私利, 避免权力被利益绑架, 甚至替问题企业捂盖子。

更重要的是, 管理者应确保各类社会消费品的充足供给, 敦促生产者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与标准, 尤其应对食品、药品、生活必需品实行强制安全认证。让质监获得一票否决权, 使质量安全常态化, 才能破解对特制与特质的迷信。从根本上消除特权享受特供, 也是实现公民权益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关新闻报道见 A13·中国新闻)



## 新民随笔

# 保安老赵

季颖

老赵, 安徽蚌埠人士, 来沪打工多年, 在我居住的小区做保安亦有六七载。老赵与住户相处甚睦, 遇到熟识的孩童, 尤喜逗弄一番, 家长不以为忤。每逢佳节, 别的保安大都回家探亲, 老赵却端坐岗上, 日夜守望。常有住户开车经过, 摇下车窗, 扔包香烟, 说一句“老赵, 辛苦了”。

近日夜归, 遇其值班。寒暄后, 老赵突然问: “听说业委会发表格征求你们意见, 要换物业了?” “不是换, 自是续聘现物业还是招标其他物业。”

“你觉得业委会会续聘我们吗?” 这个问题, 还真不好回答。续聘现有物业还是招标选聘新物业, 得看业主投票结果。在我看来, 现在在这家物业还过得去, 可小区网络论坛上, 不满的呼声似乎更高。最要命的是, 现有物业与业委会的合同半年前就已到期, 如今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随时可能下岗。老赵有此一问, 自是担心自个儿的饭碗。

“老赵, 你现在月工资多少?” “全部加起来 2300 多块。” “刚来的时候呢?” “800 多块吧。” 六七年间, 老赵这样的保安工资翻了近 2 倍。在我入住小区的 2002 年, 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 535 元, 而今年是 1450 元, 十年间已近 3 倍。我想起表格上的另一个选项: 同不同意把物业费由 1.55 元/平方米涨到 1.75 元/平方米。我的选择是“同意”。十年来, 人工成本涨了多少? 物价涨了多少? 物业费涨一点的确应该。实际上, 为压缩开支, 这几年小区保安、保洁、维修工不断减少, 监控、绿化等捉襟见肘, 物业服务质量和小区安全环境大受影响。

在很多业主还常年拖欠物业费的情况下, 启动物业费上涨的动议有点像奢望。然而, 物业费入不敷出的现状, 迫使许多小区的业委会和业主不得不尝试解决这个难题。在本小区业主论坛上, 支持提价的人占了相当数量——谁也不愿意从口袋里多掏钱, 但如果这样能改善物业服务, 提升小区品质, 最终受益的还是业主自己。实现物业费上涨的关键, 一是账目要透明得让业主看得懂, 二是物业服务要改进得让大家看得见。这也是当下社区自治亟需面对的考题。

“要是这次你们不聘我们, 我得到别的地方找工了……或者, 回老家去。”老赵边说边把手揣进裤兜, 有点黯然。深秋的夜晚, 寒意颇浓。我忽然发现, 这个在眼皮子底下呆了六七年的保安, 除了一身制服, 从没见过他穿过别的衣裳。

## 媒体视点

■ 人民日报《“另类讨薪”呼唤制度救济》: 在社会转型期, 更需要尊重民众的多元化利益表达, 更应建立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只有利益协调机制跑在前面, 人们的正当权益及时得到维护, 社会运行才能健康有序。(秦淮川)

■ 中国青年报《“自媒体”是个被夸大的概念》: 个人微博的影响力再大, 再有公共精神和公益追求, 也只是私人的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 不具备公共属性。媒体的核心, 不在于“媒介”, 而在于对信源负责任地求证并把关的能力。(曹林)

■ 大众日报《公证不能成了渔利事业》: 公证事业应该以公益为本, “不以营利为目的”, 纵使不能实现免费公证, 至少应实行低标准收费。只有坚持低标准收费以至免费公证, 才能够实现公共服务的公益目的。否则, 可能会自然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公证体系之外。(许斌)

# 缓解“月薪惶恐”关键在稳定预期

## 新民网论

近日, 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 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 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 9000 元左右, 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 5000 元上下浮动。

一般而言, 只要收入超过城市一般实际支出水平, 就应该可以避免惶恐。一线城市的 9000 元, 二线城市的 5000 元, 基本属

于中等收入水平, 应该说是高于城市一般实际支出水平的。“不惶恐月薪”之所以相比现实生活支出出现不小的“溢价”, 一方面体现出人们对于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向往,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包含了对生活成本上升、社会保障不足的担忧。因此, 稳定公众生活成本、稳定物价预期,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提高公共决策的稳定性、透明度, 才能有效缓解“月薪惶恐”。

要让城市普通居民心态少些担忧、多些稳定, 就需要让现有的

政府决策更稳定与透明, 进一步增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的决策透明度, 建立必要的公众意见征集程序。财政收入和支出需要有更严格的披露和监督, 也要更多地投入民生。这样, 城市居民, 尤其是中等与中低收入者有了对政策更多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在预期未来时就能有更大的把握, 他们才会对生活有更多向往、更少惶恐, 成为继续辛勤工作、勤俭节约的动力。(新民网评论员, 网址 www.xinmin.cn)

## 观点圆桌

### 地铁“刺猬包”惊吓得谁?

新闻焦点: 据北京晨报报道, 日前, 北京 5 号线地铁惊现刺猬防挤包, 有人背着硕大的红色倒刺包乘车, “一根根的惊悚吓人, 站他后面的人根本不敢靠近。”

#### 收起心中的尖刺

把自己装在刺套里, 实际上就是隔离自我, 使自己成为一座孤岛。收起心中的尖刺, 不要为了防伤害, 而不顾伤害他人。“刺猬包”刺痛的, 正是我们心底的那根软肋。 曾金

#### 是自私不是个性

“刺猬包”里装着“负能量”。多元化时代, 讲究“个性”没有错, 但不能“过分”, 不能影响到他人的利益, 否则就是典型的利己主义。 王旭东

#### 不必穷追猛打

这或是乘客对地铁拥挤的一种本能反应。再说, 80 后、90 后多是抱着好玩的心态购买, 用一段时间就没兴趣了。不必穷追猛打, 理智的做法是给他们一定炫耀和反思的时间。 叶传龙



### 真爱之旅

重庆九龙坡区六十一岁老汉杨度学, 改装了一辆三轮车, 每天带着瘫痪老伴外出游玩, 老伴的病情已大有改善, 不少读者见了报道感动地说: “我又相信爱情了。” 杜建国画

## 自由谭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 然而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 却面临着如何拥有一个幸福晚年的困惑。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 传统“养儿防老”模式受到现实挑战, 也常听身边的朋友说, 并不指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承担养老之责。那么, “养儿防老”的传统真的已经过时了吗?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1.85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 13.7%。虽然全球多数国家都在老龄化, 然而中国的老龄化却极为特殊, 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就变得比美国还“老”, 而且随着人口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发展态势, 加上家庭小型化的考验, 传统观念的转变, 养老已经是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不

得不面对的难题。

大约一千年前, 宋朝人陈元靓提出了“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名言。“养儿防老”观念, 在中国流传了祖祖辈辈, 但如今, 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工作压力增加, 使得部分老年人即使是在生病住院最需要子女照顾的时候, 也并不能享受到来自子女的亲情慰藉。特别是在城市之中, 年轻夫妇们必须考虑两个人如何赡养双方父母的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老人“自愿”住进了养老院。但随着入住老人数量的迅速增加, 养老院在照料老人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一一暴露, 惹出的纠纷呈上升趋势。据有关法院统计, 近年来受理的

养老机构涉诉案件逐年增加, 有的养老机构在三年半时间里涉讼多达十余次。当然, 我们也并不能据此否认养老机构的作用, 其实, 许多养老院通过改善环境、提高软件服务等, 不仅提供吃和住, 还兼具人际关怀、情感交流的功能, 成为许多老年人的“新家”。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养老的方式无非两种: 不是社会养老, 便是儿女养老。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特别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传统文化来看, 孝无疑是维系一个家庭, 乃至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规范, 我们的养老模式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实际上, 将 1 亿多老年人全部推向社会也是不现实

的, 只有将社会养老和儿女养老结合起来, 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中国人之所以一直信奉“养儿防老”, 主要是害怕老无所依。在传统的社会中, “养儿防老”是一种私力救济, 它主要指在经济上帮助老人。随着社会的发展, 家庭收入的增高, 社会养老保险机制趋于完善, 老年人担心的不再是物质上的需求, 更害怕的是没有情感归宿的孤独感。因此, 我们今天所谈的“养儿防老”, 更多的是提倡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给予他们日常生活帮助和精神慰藉。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 我们都不该轻言“养儿防老”过时。

# “养儿防老”过时了吗?

斐翔